

# 秦秀白

英语教育  
自选集

秦秀白 著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 ■

秦秀白英语教育自选集

Qin Xiubai's Anthology o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秦秀白

英语教育  
自选集

秦秀白 著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 ■

秦秀白英语教育自选集

Qin Xiubai's Anthology o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秀白英语教育自选集 = Qin Xiubai's Anthology o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 秦秀白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12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  
ISBN 978-7-5600-7179-4

I. 秦… II. 秦… III. 英语—语言教学—文集 IV. H3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8079 号

出版人: 于春迟

选题策划: 刘相东

责任编辑: 刘相东

执行编辑: 吴晓玉

封面设计: 袁璐

封面题字: 赵发潜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650×980 1/16

印张: 16.25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00-7179-4

定价: 26.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 出版前言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丛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第一批共推出10集，入选作者有王宗炎、桂诗春、胡壮麟、胡文仲、戴炜栋、秦秀白、刘润清、张正东、文秋芳、刘道义等英语教育名家。

本丛书专收我国知名英语教育家的学术论文，以填补两方面的空白：1. 以英语教育名家为主线的自选集；2. 以英语教育为主题的系列丛书。本丛书同时入选“北京外国语大学校级自选课题项目”。本丛书的读者对象为英语教师、英语专业研究生、师范院校英语本科生等，可作为他们从事科研、撰写论文的参考文献。入选的文章多散见于国内外学术期刊，且时间跨度很大，读者不易觅得。自选集展示了诸位名家在英语教育方面的研究脉络，汇集成丛书，将成为我国英语教育史上不可多得的史料。

本丛书将在推出第一批后，陆续推出第二批、第三批。外研社还将推出《国际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敬请读者关注。

本丛书的编写体例如下：

一、只收发表于刊物或论文集集中的学术论文以及学术演讲稿，字数没有限制。专著中的章节一般情况下不收录。

二、所收论文的语言仅限汉语和英语。

三、所收论文的内容必须与英语教育有关，如语言政策、英语教学改革、英语教学法、词典与英语教学、第二语言习得、特殊用途英语、计算机辅助教学、文学文化与英语教学、语料库与英语教学、教师培训与发展、评估与测试、课程设计与材料评估、英语专业各门课程的教学、大学英语教学、中小

学英语教学、儿童英语教学、双语教育、在线英语教育、远程英语教学，以及其他与英语教育有关的论文。

四、所收论文大多为原已发表过的文章，基本保持原貌以尊重历史的真实。文章一般注明论文发表的时间和发表刊物的名称（或论文集名称）和期号（或出版社名称）。文章格式也基本保持发表时的原貌。未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如演讲稿等，则注明对外发布（成稿）的时间、地点和场合。

五、作者可将新的观点以尾注的方式放在当篇论文的后面，表明作者目前的观点与当时有所不同。

六、书前有作者撰写的《我与中国英语教育》为自序。书后附有作者著述目录。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编委会

2006年9月9日于北京

##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编委会

主 任 胡文仲 李朋义

委 员 胡壮麟 王守仁 石坚 秦秀白 杜瑞清

策 划 刘相东

## 序

我与秦秀白教授相识已有半个世纪之久。他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校友，上个世纪60年代他在北外读书，我们接触虽不多，但我听说他是年级的高材生。“文革”后陆续听到有关他的一些学术方面的信息，欣闻他在80年代初期已有著述问世。我参与高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和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工作之后，与他经常在会议上见面，前后又有十多年。他给我的印象是认真做事、低调做人。但是，外语教育界的人都知道，无论在教学、学术研究或是在教学改革方面秦秀白教授都取得了不凡的成绩。

秦秀白教授热爱教学，热爱学生。他的一句名言是：“如果不让我教书，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做。”他对学生严格要求，勤于诱导。他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给予指导。他深信英语不是教出来的，而是导出来、学出来的。他认为教师应着力于引导学生尽快掌握有效的学习策略，开发认知能力；要用教师的人格魅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开发其学能潜力；要为学生提供各种便利，让他们能很快地找到需要的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完成学习任务；而在教学的整个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培养高尚的道德、完善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他告诫学生，要做好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他教过的学生无不为他极端负责、献身教学的精神所感动。他对于教学的深刻认识在他的自序《我与英语教育——从教40年的心路历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40多年来他一直在本科和研究生第一线教学，成绩卓著，曾被评为“广东省南粤教书育人优秀教师”，获首届“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2003年他荣获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该奖

项是经过层层审查，专家评定，最后由教育部审定通过的。该奖项的获奖人共计一百名，而在外语界仅有极少的几位教师获此殊荣。

秦秀白教授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并不是因为他的学习和进修条件特别优越。他戏称自己是自学成才。他的最大乐趣就是读书。他不仅注意研读经典著作和专业书籍，对于学术期刊也经常浏览。他注意掌握最新的学术信息。在外语界谁出版了一本新著，谁发表了什么论文，最近有些什么争论，他都了如指掌。我记得多年以前在《外国语》上读到 he 给编辑部的一封来信，在信中他指出期刊上曾经刊载了一篇抄袭他人的文章。他将原文和抄袭文章作了仔细的对照，对这种现象提出了批评。这既说明了他博闻强记，关注学术动态，又说明他坚持原则，容不得抄袭作假的治学态度。“读书—教书—写作”是他的生命链。正是由于他的勤奋，早在1981年他出版了《英语简史》一书，继而在1983年发表了国内第一部英语文体学专著：《英语文体学入门》。之后在此基础上又主编了《英语通论》，陆续发表了《文体学概论》和《英语语体和文体要略》以及一系列有关文体学理论层面和体裁教学法的论文，说明他在国内一直处于文体学研究的前沿。

秦秀白教授主编的《当代英语习语大词典》是国内出版的规模最大、篇幅最长、质量上乘的英语习语词典。众所周知，习语是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一大障碍，也是较难处理的语言现象。要编写一部反映当代英语习语用法的词典谈何容易。秦秀白教授带领60余位教师历时8年编写了这部词典，受到专家们的一致好评。2001年这部习语词典获得第四届中国国家辞书奖二等奖。

随着新的教育技术的出现，秦秀白教授又在华南理工大学外语系组织了一批教师从事“《大学英语·精读》（修订本）多媒体教学与辅导”光盘的开发。这是一项全新的工程，从策

划创意、收集材料、编写文字材料、设计软件到制作多媒体光盘，秦秀白都起到了一个学术带头人的作用。复旦大学英语教授董亚芬认为，这是一套设计合理、内容丰富、语言流畅地道、图文声并茂，达到国内一流水平的课件。这套多媒体教学课件由于其独创性和高质量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和广东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光盘出版以后，深受各大学学生的欢迎。这部自选集中有三篇文章记录了秦秀白教授和他的同事开发这一多媒体课件的过程和取得的宝贵经验。

秦秀白教授积极投身于外语教学改革，参加了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外语教育领域的所有重大改革。他担任高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和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前后达 20 多年，是担任这一职务年限最长的几位委员之一。他参加了教学大纲的制订、教材的审定和评选、英语专业四、八级测试的推广、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探讨、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评估等一系列重大教学改革活动，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理工科大学外语教学改革方面，他更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科建设他一直十分重视，在他执教的华南理工大学外语学院，他在学术研究、课程开设、人才引进、培养研究生诸方面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在自选集的几篇文章中特别着重谈到了他对于学科建设的看法，特别是在《我与英语教育——从教 40 年的心路历程》的结尾，他提出了五点意见，其核心是敦促教育部各级领导和校系领导重视外语专业的学科建设。秦秀白教授的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国家级教学名师荣誉的获得、多部学术专著的出版、英语习语大词典的编纂这三项对于绝大多数教师来说只要做到其中任何一项都已经十分难得，但秦秀白教授集所有这些于一身。他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近两年又带领一只新队伍开始编写一套新的教材：《新时代大学英语系列教材》中的《综合英语教程》。我们期待这一套包含新的教育理念、新的教学原则



的教材的出版，我们期待秦秀白教授在新的征途上取得更大的进展。我们为北外的校友中出现了像秦秀白这样的学者和教授而感到骄傲。

胡文仲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7年1月于北京

# 我与英语教育

## ——从教 40 年的心路历程

到 2005 年 9 月，我从教整整 40 年，加上在大学期间学习英语的 5 年经历，那么我和英语已经打了 45 年的交道。“光阴似箭”、“人生苦短”之类的感叹已开始挂在嘴边，可是当我回顾这 45 年的经历时，又觉得这竟是一段漫长而艰难的奋斗历程。平时我喜欢对学生说：“走路要留下脚印。”可是真的让我回首审视自己的脚印时，我却感到惭愧：脚印虽留下了一些，但很模糊，也很浅薄，而且有些经历过的事情也很难说得清楚。然而，回顾往事，有两点是说得清楚的：一是我认为自己能坦诚对待人生，一直在遵照屈原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而自学不止；二是我热爱教育事业，是个尽职尽责的教师。人生其实就是个奋斗的过程，成就可大可小，但只要你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社会尽了力，那就是有意义的人生。感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给了我回顾自己心路历程的机会。我想把自己在英语学习和英语教学中经历的一些事情记录下来，稍作反思，也许能对青年教师的成长有所帮助。

### 初上讲台

1965 年 7 月，至今还让我留恋的五年大学生活结束了。我服从国家统一分配来到刚刚成立一年之久的武汉外语专科学校任教。离开京城来到江城，其实是极不情愿的。因为毕业前，年级政治辅导员曾很郑重地约我谈话，问我肯不肯留校教书，我曾欣然同意；后又有一位年级学生干部问我肯不肯继续留在北外做研究生，我说求之不得。公布分配结果的那天下午，全年级的毕业生在北外东院的一个大教室里集中，领导当场宣布：我被分配到武汉外语专科学校任教。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但也深信没有其他选择，所以第二天我向年级党支部递交了一份草草写就的“决心书”，表示服从分配，很快就办理了离校手续。让我感动的是：离校前的一个晚上，丁往道老师、杨树勋老师和薄冰老师来到我们宿舍，和毕业生话别。他们都特意鼓励我，说武汉外专将很快办成武汉外语学

院，希望我能安心工作朝前看。他们的嘱咐令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武汉外专是1964年创办的，同时成立的还有广州外专、杭州外专、济南英专、秦皇岛外专、哈尔滨外专等。后来得知，国务院原计划在1967年将武汉外专扩建为武汉外国语学院。该校当时有两个专业：英语和法语。英语教师有80名，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由兄弟院校派来的教学骨干；一部分是来自涉外部门的具有实践经验的英语人才；但绝大多数是来自当时的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大、北京师大、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外贸学院、张家口解放军外语学院等高校的64届和65届毕业生。几十位朝气蓬勃、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带着各高校的文化传统和学术特长汇集在一起，使得这个新建的专科学校颇具生机，给人一种团结和谐、蒸蒸日上的感觉。我立刻融入这个集体，因毕业分配失意而产生的怅惘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忘我的工作热情。

我接手的班是64级第12班，教“精读”和“口语”两门课程。初上讲台，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教学法、什么是教学大纲、什么是教学改革，更不知道什么是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甚至连该校的定位和培养目标是什么都不十分清楚，也很少听到领导谈论这方面的事情。尽管如此，和其他年轻教师一样，我满怀激情全心投入教学，兴奋地体味着初上讲台给我带来的快乐。我们这批年轻人虽然没有什么经验，但我们有饱满的工作热情，有忘我的工作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而所有这些情操都表现得那样的朴实和纯真，那样的自觉和坦荡。没有人监督你，没有人告诉你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完全凭借良知对你本能的呼唤，大胆地去做你认为是该做的事情。

武汉外专给我留下的一个难以泯灭的印象是学生的朴素和勤奋。由于多数学生都是工农子弟，质朴忠厚是他们普遍具备的品行。大家以生活朴素为荣，以勤奋读书为乐。除一日三餐和必要的体育锻炼外，他们整天都在学习；看不到在教室里吃零食或戏耍的现象；更看不到男女携手或幽会于月下林阴的场面。浓厚的学习风气应当归功于学校领导的严格要求。校长刘昂是一位“老革命”，且有教授职称。只是那时“教授”头衔一点不时髦，也一点不响亮，他本人从不以“教授”自居，旁人也从不提及。刘昂校长特别重视外语基本功训练。他主张早晨是学习外语的最佳时刻，于是规定：学生起床后要集体进行早锻炼，但必须以“不

出汗”为原则，而后必须到露天朗读课文，班主任（一般由“精读课”老师担任）必须陪同学生早读。于是形成了当时武汉外专办学的一大亮点——“早读”。他还身体力行，经常带领教务处的干部一大早就到教学区检查，亲自查看早读的指令是否落实。记得有一天早读时，班上有几位学生要求我给他们纠音，我一时大意，带他们到教室录音，被校长和几位干部撞个正着，记下了我的名字。当天上午课间操时，教研室主任就找我谈话，把我批评了一顿。我从此就把“早读”视为校规。然而，“文革”期间，“早读”却成了校长“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大“罪状”。现在看来，“早读”的做法完全没有错。

遗憾的是，今天的大学校园里很少能见到早读景象了。尽管今天的学习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大大改善了，但恕我直言，今天的大学生中，有些人不是来求学成才的，而是来“过生活的”，他们把大学当作“人间天堂”，不思学业，不求进取。我常为此感到烦恼，真是恨铁不成钢。有时看到学生上课时嘀嘀咕咕，不认真听讲，不好好完成作业，甚至从网站上直接下载别人的论文充当自己的课程论文，我感到愤慨，感到自己受了侮辱。这时，我常常想到当年武汉外专的学生，他们虽然是专科生，但他们很可爱，的确令人难以忘怀。

在武汉外专满怀激情地教了10个月的书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1966年6月，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好不容易熬到了“斗”、“批”、“改”告一段落，可以“复课闹革命”了，没想到上级下达一道命令，这个“文革”期间被喻为“庙小妖气大，池浅王八多”，且曾被“红卫兵小将”改名为“亚非拉大学”的武汉外语专科学校于1970年底宣告解散。我经历了第二次分配，到了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

初上讲台的那种心态近似天真无邪。正是因为没有经验也没有阅历，所以才没有任何精神包袱，所作所为都是那样的纯真，那样的无忧无虑。现在回想起来，“文革”前10个月的教学生涯，其实是最开心的。我相信，每一位教师都体验过那种近似原始的、朴素的教学心态。这恐怕就是人们常说的“凭良心教书”的那种职业感。我至今认为，当教师就要找到这种感觉，要保持这种感觉，并将其升华，因为它太宝贵了，也太重要了。

## 困惑的岁月

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是我国英语教育事业全面倒退和彻底崩

溃的时期，也是英语教师备感压抑、无所适从的年月，的确不堪回首。就我个人而言，虽然“文革”期间还不是“革命”对象，但我也受到了精神上的折磨。1971到1976年间，除了去农村参加“教改小分队”和去“五七干校”锻炼之外，我一直在教学第一线讲课。回想起来，当时有三个问题让我感到困惑。一是课堂教学如何“突出政治”的问题。当时流行的观念是：课堂教学若不“突出政治”，那就是鼓吹“智育第一”，而且还要把“政治”落实到每一个教学环节中。这的确很难。能够做到的就是在备课时要小心挑选例句，尽量制造些能结合当时政治形势的例句。后来，领导还特意组织我们到当时的海军工程学院听了一堂课，学会了在每节课前的“开场白”和“结束语”中说些结合形势的话语，即便是口号性的语言，却也能聊以自慰。可是到了1972年冒出了个“反回潮”运动，进而发生了批判“马尾巴功能”的事情，我们惯用的这些“突出政治”的良方均被斥为“穿红鞋”、“戴红帽”，极不可取。庆幸的是，来自农村、工厂和部队的学生多是质朴的青年，他们在课堂上关心的仍旧是词语的用法和句子的结构，所以虽然围绕这个问题感到无所适从，倒也平安无事。另一个让我感到困惑的问题是教学内容，尤其是教材的选材问题，弄得不好又是鼓吹“封”、“资”、“修”。在那个时代，领导曾分配我到教材组工作一年，从选材、注释到去印刷厂排版印书，全由我们五六个人承包。其中最难办的是选材。因为当时的第一标准是“思想性”，而“思想性”的标准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还要贯彻外语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难矣！第三个问题是师生关系问题。按照常理，我们这些年轻教师在处理与学生关系时不该有什么伤脑筋的地方。可是在那些岁月里，我们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个十分复杂的矛盾体：就业务而言，学生是很尊重教师的，他们渴望多学一些知识；可是在政治上我们并不平等。学生的任务是“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而我们的定位是“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这样的定位导致彼此在进行心灵沟通时常常感到尴尬。这自然带来两个直接的后果。一是我们不敢在业务上对学生严格要求，也不敢实施因材施教。我记得有一位来自山区的学生，他是当地公社人民武装部部长的儿子，小学毕业后就被推荐来读大学。他有一次很严肃地问我：“人的‘手’是可以活动的，那么你为什么还说hand是名词呢？”我无言以对。对待这样的学生你是不能批评的，更是不能劝其退学的，因为当时的口号是：“不能让任何一个阶级兄弟掉

队!”你明明知道他不适合学习英语,基础太差也学不好英语,可是你必须耐心地笑脸相待,学期结束时还得为他写下“学习刻苦努力,进步显著”之类的评语,个中滋味是很折磨心灵的。没有哪位教师不喜欢悟性好、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可是在那个年月里,你不能表露你的好恶倾向,否则又是“智育第一”思想在作祟。记得有一位学生年龄较大,见识也较广,他曾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学一点莎士比亚的东西。我只能对他一笑了之,也不敢找本莎剧借给他读。不过,有一天晚上,我到教室里去巡视晚自习情况,发现他在读一本很破旧的 Charles 和 Mary Lamb 合写的 *Tales from Shakespeare*。我暗自惊喜,会意地对他一笑,却没敢多说什么。尴尬的师生关系带来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虽然那些年的教学质量低下,但多数毕业生却很自信,很少能听到“英语很难学”或“自己的英语不能适应工作需要”的声音。1971年春在下乡搞教改、为农村中学培训英语教师时,我曾遇到过一位只学了三个月英文的民办教师,他说他已经在中学教了三年英语了,还曾被评为“模范民办教师”。从他的谈吐中我并没有察觉到什么遗憾的心情,反倒觉得他很自信。

提及这些看似琐碎的往事,并不是我对过去的事耿耿于怀。该发生的事毕竟都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也发生了,都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已为那令人困惑的动乱年代做出了公正的结论,经历了那场灾难的每个人也对人性的弱点和丑陋进行了足够的反思。只希望年轻一代不再经历我们曾经感受到的那些困惑和不安。

## 走出国门

历史赋予 1976 年的主题是: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我国的英语教育事业出现了新的曙光。1978 年春,学校通知我参加教育部组织的高校英语教师出国进修的全国统考。如通过考试,则可被派往英语国家进修一年。这是做梦也难以想到的良机。我幸运地通过考试,被派往马耳他进修一年。同行的共有 10 名高校教师,分别来自当时的吉林师范大学、大连海运学院(现大连海事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南开大学、天津财经学院(现天津财经大学)、山东聊城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广州外语学院(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云南大学。还有 10 名来自各个部委的年轻翻译,他们的学习时间是一年半。与被派往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修的教师相比,我们这些赴马耳他进修的人难免有些快不快,但后来

听说，原本是要派我们到尼日利亚进修英语的，于是大家反倒感到庆幸了。国门刚刚打开，中美尚未恢复邦交，我们能破天荒地作为首批出国进修教师走出国门，对单位、对个人都已经是十分幸运的了。

马耳他位于地中海中部，有“地中海心脏”之称，是闻名世界的旅游胜地，被誉为“欧洲的乡村”，但没有森林，没有河流，也没有湖泊。全国由5个小岛组成，其中马耳他岛面积最大，约200多平方公里；海岸线约180公里；人口不足30万；首都瓦莱塔（Valletta）。马耳他1814年沦为英国殖民地，1964年独立，1972年和中国建交。马耳他有两所大学：一所是The University of Malta；另一所是The New University。我们10名教师被安排在The New University进修。

在大使馆的精心安排下，该校为我们10名教师单独组建了一个班，由三位马耳他教师讲授和语言学、文学相关的课程。说得明白一点，类似在国内请外教办了个“助教班”。我们过的也是集体生活，使馆为我们统一租房，集体住宿，轮班做饭，后勤供应全部由使馆定期提供。按照当时的规定，我们享受援外工人的待遇，除国内工资照发外，每人每月有相当于40元人民币的津贴，折合成当年马耳他货币约为2.35马镑。使馆还规定：原则上实行“三人同行”的制度。除周末外，每天上午要去上课；下午可以到学校自习，也可以在宿舍自学。马耳他人对中国人非常友好，他们多能讲英语和意大利语，据说当地的儿童先学英语，后学母语马耳他语。为了提高听说能力，使馆为我们准备了两步电影放映机，并与马耳他电视台联系，每周都免费向我们提供一批美国的老电影片（多为“西部片”）。我们则轮流值班放映电影。马耳他电视台有三种语言的节目：英语、意大利语和阿拉伯语。因此，看英文电影和电视是我们每天晚上的主要学习活动。周末，使馆或开车把我们带到海滨游泳，或带我们到大学球场打打篮球。为了提高英语的口头交际能力，使馆为我们聘请了英国文化委员会驻马耳他办事处的一位女职员，由她每周和我们分组聊一次天，实际上相当于“小班口语课”或“家教”；使馆还帮助我们和已在马定居的英国退休老人建立定点联系，结成“口语对子”，我们可不定期地通过预约登门拜访，练习口语。后来，我们向使馆提出：我们既然是来进修英语的，应该容许我们去电影院看看电影。使馆领导研究后，最终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但每月只能出去看一场，且事先需申报片名由使馆审批。至于与国内单位和家人联系，则需要通过外交部的信使队。信使每月来一次，带来家人或单位的来信，带走我们的回信。

回想起来,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在马耳他进修的学习和生活的确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我们都十分珍惜那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我们亲身感受到了祖国改革开放初春的温暖和重托。与今天出国留学进修的人相比,我们当时却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不需要为个人生计操心;不需要打工挣钱缴纳学费;集体生活和大使馆随时随地的关照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安全感和家庭般的温暖。就学术水平而言,马耳他的大学自然无法和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大学相比,但图书馆里的藏书还是相当可观的。因此大家都十分投入地根据自己的学习计划自修学业,圆满地完成了各自的学习任务。

就个人而言,首次走出国门,收获不少,体会良多。首先,走出国门才真正体会到“祖国”、“中华民族”这些词语的深切含义。在那缠绵的思乡情绪中包孕着对祖国的无限思念。离家远了,离祖国却更近了。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如饥似渴地关注着国内时政要事,关注着国内的各种新闻,只要从使馆拿来国内的报纸,大家都会停下手头的事,争先阅读。如果谁从家人来信中得知国内发生的一些事情,他会第一时间在饭桌上与大家分享。尽管我们在国内都经历了十年浩劫,但祖国就是祖国,出了国门就更感到祖国可亲可爱。

其次,走出国门,学术视野变得开阔了。在国内学英语,多注重词汇和语法,无法亲身体会语言和文化的“联体双胎”关系;到了国外,学会了从文化视角看待语言现象和语用规律,语言现象变得生动活泼了,文化现象也不再抽象了;对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种种差异也能客观地予以理解了。出国前,我对西方宗教了解甚少。到了马耳他,我被强大的宗教文化包围了。阅读基督教和天主教有关史料使我对西方文化、西方文学乃至西方建筑等都有了一些感性认识,我深切感受到:不了解西方文化,不注重文化差异是无法学好英语的。

走出国门的另一个深刻感受是:要做个合格的高校英语教师,不能只凭借听、说、读、写等诸方面的技艺,而要勤奋读书,丰富自己的知识,努力做个学者。我们这些自称是大学英语教师的人,其实并没有什么“资本”可言,你的职业和工作性质决定了你只能活到老,学到老,永远不能停止,因为学习任何一种语言,其实就是运用那种语言和它所具有的特有思维方式去重新描写和认识永远都处在变化之中的客观世界,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就英语教学而言,技艺训练(如语言基本功)是重要的,但这些技艺只有在特定的舞台上才能展示其功用,而



社会知识、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才是构建这个舞台的支柱。马耳他的一年进修，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补课机会，使我有机会阅读了一些有关西方文化和语言学方面的书籍，也阅读了一些以前听说过但没有读过的现代文学作品。

1986年我赴美国访学一年。先应邀在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Dominguez Hills 为本科生讲授中国历史文化、中国文学和汉语等方面的入门课程，后应邀到耶鲁大学 (Yale University) 英语系从事研究半年。在我的心目中，第二次出国访学既是第一次出国进修的继续，也是自己读书、教书、治学生涯的新的起点。耶鲁大学英语系的强项自然是文学和文论。但仅仅半年时间，是难以融入这个世界著名学术殿堂的，所以除自学外，我要充分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学点无法通过自学了解的知识。于是明知自己基础不行，最终我还是选修了著名英语史专家 Fred Robinson 教授的“古英语”和“古英语诗歌”两门课程。前者使用的教材是 *A Guide to Old English: Revised with Texts and Gloss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2)，由牛津大学的 Bruce Mitchell 和耶鲁的 Fred Robinson 合著；后者使用的教材是耶鲁大学英语系教授 John C. Pope 编写的 *Seven Old English Poems* (Norton Paperback Edition, 1981)。此外，耶鲁英语系办公室还安排既精通中世纪文学又通晓西方文论的 Marie Borroff 教授作我的指导老师，每周星期二下午对我个别面授答疑。Fred Robinson 和 Marie Borroff 都是耶鲁的终身教授，学识渊博，和蔼可亲，又不乏幽默感。和他们相处，极为快乐（后来我得知，他们都是李赋宁先生的海外朋友）。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Dominguez Hills 和 Yale University 是两所档次不同、传统不同、校风不同、学生和教师的风貌也很不同的大学，但我在他们的教师身上找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孜孜不倦的学者，毕生致力于教学和学术研究；既传授知识，又创造知识。在他们平凡的工作和简朴的生活中，教学和科研已经融为一体，实现了完美的统一，成了他们生活的主旋律。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知识不仅是力量，知识还是人格和尊严。耳濡目染，不能不受到激励。

## 苦与乐

就学历而言，我是个“残疾人”，没有任何学位证书。我倒不是迷信学位证书，但取得学位证书（尤其是博士学位证书）的过程毕竟是个丰富知识、陶冶情操和学习治学方法的过程，那个过程其实比那个结果